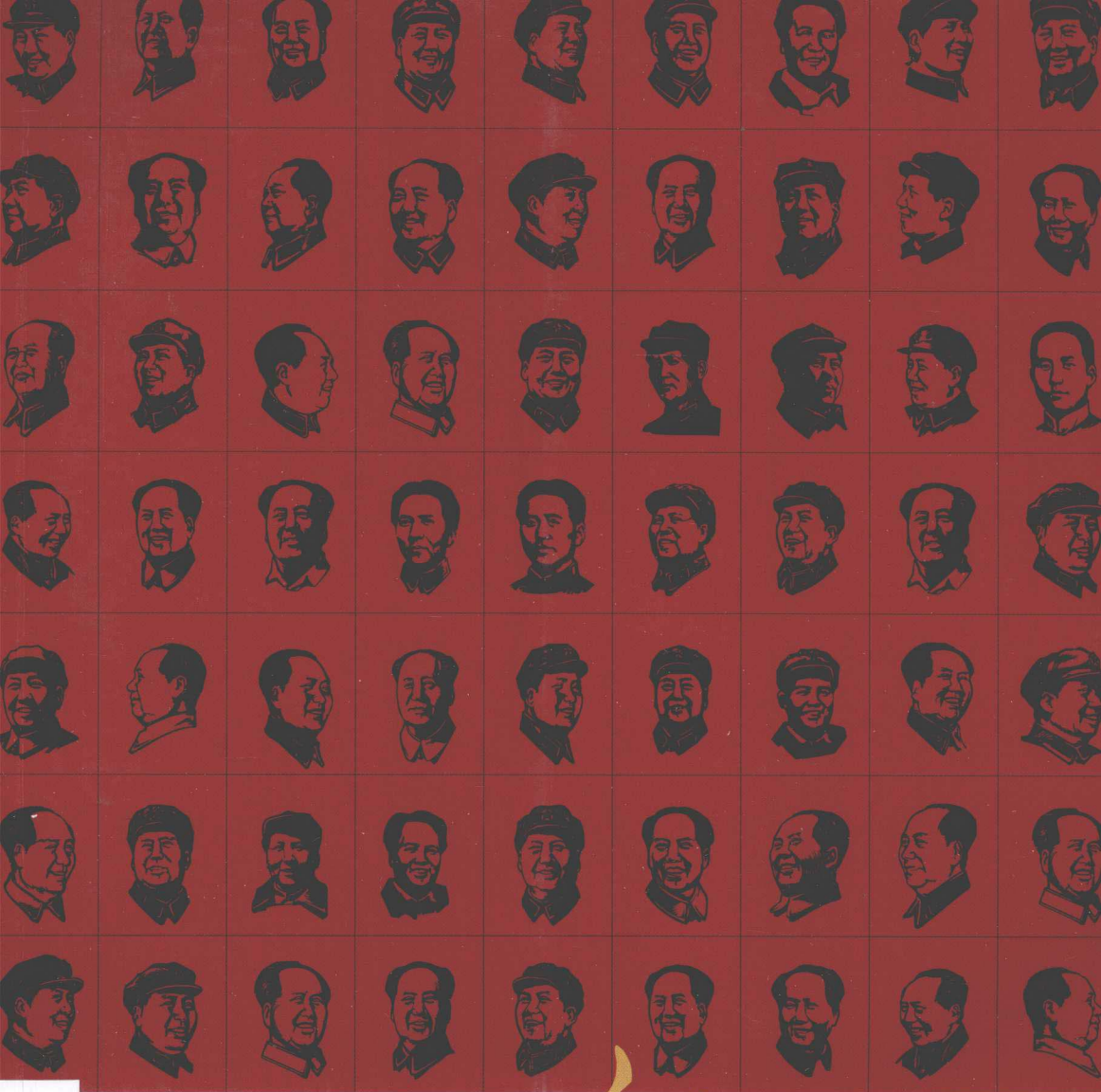




说不尽的毛泽东^上

——一百位学者名人访谈录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不尽的毛泽东/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73-3717-4

I. ①说… II. ①张…②边…③吴…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 人物研究 IV. ①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3848号

说不尽的毛泽东

编 著 /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

责任编辑 / 彭 勇

封面设计 /  彭 勇

责任印制 / 寇 炫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网 址 / www.zywxpress.com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010-66513569、63097018、66183303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 × 960mm 16开 58.25印张 880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3717-4 定价: 110.00元(上、下)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自己却在一旁微笑；他好词曲诗赋，每逢对手便高谈阔论，却脱不掉许多农家的习惯；他尝过受打击遭冷落的压抑，更感受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他不是神，却是一个非凡的人；他足智多谋有胆有识，是中国乃至国际政治舞台的赢家，但后来输给了自己……

走大街穿小巷，过闹市进书斋，一辆自行车载着我许多感慨。

四季匆匆，每天都会有新感觉。时装精品屋，证券股票交易，跳槽与“炒鱿鱼”，合资的企业独资的公司，还有广告拉锯战与物价指数……

如今，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精彩，是不是？

如今，伏在巨人的身影底下生活，并不是所有的人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这是我们时代的进步。

100个人眼里有100个毛泽东。只是那个唯一的毛泽东不再醒来。只是我们拥有的今天是他那个时代的延续，这一点无法更改。

我面对着毛泽东，也面对着今天的生活。做你决定去做的每一件事并为此尽心尽力，我这样对自己说，不仅仅是这本书。

张素华：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无法了解20世纪的中国。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本书。面对他至今还感到对他的认识和理解远远不够。

还有人说，分不清毛泽东的是与非，就迈不开现代化的步伐。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既很伟大又很复杂，有时他距我们很近，有时又距我们很远。但我们必须了解他。这不仅仅因为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因为他还影响着我们的现在。

那么怎样才能更客观更深入地了解他呢？有一天突发奇想，如果搞一部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把各位研究毛泽东的成果，通过交谈的方式，轻松愉快地反映出来，或许对人们深入了解毛泽东有所帮助，这对我们也等于上了一百堂好课。何乐而不为！次日和晓梅谈起，她说好。又找边彦军，他说成。说干就干，我们三人骑上自行车，来往于各位之间。他们谈毛泽东的情趣、性格，纵论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误、辉煌和悲哀，瞭望他在中国及其世界的地位，挖掘他的思想渊源，透视他和战友们关系等等。或深、或浅、或详、或略，积数年之功，述各家之长。如果读者能有和我们同样的感受，首先要感谢他们。

1992年12月于北京前毛家湾

访陈涌——	
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我见	112
访李树庭——	
文如其人，书如其人	122
访庄福龄——	
讲个大题目：如何建设当代中国哲学	128
访雍涛——	
毛泽东的哲学构成体系吗？	140
访周抗——	
毛泽东的辩证法有什么特色？	145
访谭双泉——	
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153
访苏星——	
毛泽东不懂经济吗？	159
访姚杰——	
毛泽东百战百胜吗？	167
访廖国良——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有指导意义吗？	177
访张家裕——	
毛泽东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	187
访周逸——	
毛泽东一生的愿望：建设好一个党	194
访黄铸——	
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好	202
访陈雪薇——	
知识分子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知识分子	207
访王兴国——	
杨昌济的得意学生	215
访萧超然——	
毛泽东和北京大学	223

访于南——

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去358

访王年一——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侧面366

访陈明——

毛泽东对丁玲说：几十年看一个人375

访金冲及——

毛泽东和周恩来392

访陈绍畴——

毛泽东和刘少奇408

访刘学民——

毛泽东和朱德418

访章学新——

毛泽东和任弼时428

访吴克斌——

毛泽东和陈毅438

访陆定一——

毛泽东和中国的过去与今天

陆定一

陆定一，1906年生，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42年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曾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中全会增选），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著述编有《陆定一文集》。

好事多磨，能采访到陆定一，着实让我们费了一番周折，还要感谢他的秘书宋广为同志。老人已八十有六了，但依然精神矍铄，风趣健谈，反复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缺了毛泽东不能成功，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邓小平。邓小平，大好人啊！讲到这，他还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你们有福气，赶上了好时候！

访问人：陆老，明年，即1993年，是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对毛泽东的认识。

陆定一：1983年毛泽东同志90诞辰时，我曾写文作为纪念，不觉一晃又10年了。这10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又取得了巨大成绩。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给你们谈些什么呢？还是从毛泽东和共产党说起。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导者，他又是党的一个党员。要了解他的生平，需要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像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样，有她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革命时期，在革命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上，我

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是容易懂得的，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回顾一下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以为我们党既然在革命问题上是个成熟的党，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是成熟的党了，不会再有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或者这个过程不会像革命时期那样曲折，可以迅速取得成绩。这是幼稚的想法。虽然我们党曾经试图较早或较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照搬了一些过去在革命时期的经验，如大搞群众运动，以大抓阶级斗争带动生产等等，实践证明那是错误的，走了许多弯路，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一些曲折。

这些曲折，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虽然党在革命问题上已经完成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要重新经过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

这是我们党的发展的第二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要从头来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幼年时期的党还要经过胜利与失败，然后才能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些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幼年的党，只要是工人阶级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她的前程总是光明的，她不会衰败下来，而能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幼年时期所犯的 error，取得教训，发展马克思主义，变为成熟的党，走向新的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访问人：党的第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是不是就是十三大讲的“第一次飞跃”？

陆定一：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第一个飞跃”，也是这次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第一次革命。无论用个什么概念概括，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第一次飞跃也好，第一次革命也好，无疑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和王明的教条主义分歧在哪里呢？在实际经验吗？从实际经验看，王明一伙当然不能和毛泽东比，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亲身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对中国传统的参悟是如此深透。王明在这方面是无知的。在理论方面吗？过去有一种传闻，说王明会背马列语录，他只不过会背而已，借以唬人。他背的那些教条，从概念到概念。“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博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的自我检讨中说的。你看，教条主义就是“两个凡是”。博古

做了这样的检讨，说出他的心里话，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点出了王明路线的根源所在，他就变成了好同志。王明有功劳么？没有。王明有威信么？也没有，在王明的宗派中也有人认为他并不高明。这样的人居然能登台，是因为他对一个俄国人叫米夫的阿谀奉承，和向他“告密”、诽谤和陷害许多中国同志，取得米夫的信任。米夫当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1931年初秘密来到中国，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迫“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料想不到的，出乎意外，突如其来的。但问题是这又是合法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纪律上要服从共产国际。这又是毛泽东同志和王明斗争所以时间那么长，造成那么大灾难的原因所在。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我们党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才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到成熟。“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它的意义相比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王明路线统治了4年，革命眼看将被断送，干部中怨声载道。遵义会议还是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内部起了分化的时候开的。他们之间分化了，于是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多数，赞成毛泽东起来领导。要记得，即使广大干部不满，但不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内部分化的时候，王明路线不会倒。

遵义会议没有请示共产国际，也没有向它报告，因为无线电联络已因电台丢失而没有了。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国际出来干预，那结果可能不同。遵义会议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开的。不是生，就是死，没有中间可循。

访问人：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还是派人去国际汇报了，这是否说明我们党还是没有摆脱共产国际？

陆定一：不能仅看它的形式，要看到实质。我们的组织关系没有变嘛，还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向上级汇报是要征得它的支持（包括谅解）。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给党中央的口信，说：“中国党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同志。全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王明同志不要再玩花样。”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

熟不成熟的界限。1957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7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你看，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是清醒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取得经验的时间那么长（21年，比14年还多），所花的代价那么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呢？为什么首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倡导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

搞清这些问题，我认为有这么几点：首先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经验的获得，归根结底要靠自己的摸索和积累，别人的经验再好也是在人家的环境中适用的，何况那些经验我们党较早就觉察到它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犯错误是在摸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中走了弯路，教训极大。反过来，它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反面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需要个人崇拜。三则，因为他老了，人一老，就受到精力及观察能力的限制，即使想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力不从心了。以上三个原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恰当分析，直到今天，我认为都是对的，很中肯的。

访问人：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呢？您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参与了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又熟悉毛泽东的生平和实践，能否谈一谈。

陆定一：我不揣冒昧，提供几点供参考研究。旧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是从那时起，多少志士仁人怀着振兴中华的愿望奋起抗争。要振兴中华，就要建设，或者说，要发展生产力。但是，要发展生产力，就须要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在清朝，有个“洋务派”，想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建设，失败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实业救国”高唱入云，又失败了。在蒋介石

大，二七一十四，很有意思的数字。有了这条路线，我们就可以把握前进的方向了。也许以后还有补充，还会有些改正，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曲折与反复，但根本的路线就是这些了。小平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依我看，100年以后还要以它为依据，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我是赶不上啦，你们好福气呀！这也是全国人民的福气。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好好干吧！

1992年12月24日于北京医院

访龚育之——

两场革命·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

龚育之

龚育之，籍贯湖南长沙，1929年生于湘潭。曾任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兼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和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出版的著作有《在历史的转折中》、《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等。

这样一个题目找谁呢？我们找了龚育之，他欣然应允，话匣子一打开，洋洋洒洒，感慨万千。这时离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不到半年，听说十四大报告正在起草中……

访问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这套新的理论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请就您的研究和体会给我们谈一谈。

龚育之：我们现在讲中国共产党历史、讲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史，通常都是把它划分为两大段，一个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个是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又分为五小段：五四运动和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时期又分为四小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按这个划分来写的，相应地写了九章。

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胡绳同志同我们一起议论，提出过这样一种意见，即在党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上，应该更加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就是说，如果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可以考虑把党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党史教科书分为三大篇：第一篇为民主革命篇，写党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其间经历两次大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二篇为社会主义前篇，写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中间又经历两次大的曲折，最后以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三篇为社会主义新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很难说。也许是到本世纪末；也许要到下世纪20年代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小平同志今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也许要到下世纪中建国100周年的时候，那时，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比较发达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访问人：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全新的、很重要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龚育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被看作党史上一个大阶段、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不只是建国以后这个大阶段里的第四个小阶段。《七十年》一书还没有分三篇来写，但在后记中讲了这个观点。去年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遵义召开的讨论会上也讲了这个观点。

现在，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从“第二次革命”的观点来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直接提出这个命题，是在1985年。从思路来说，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已经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

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也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次全会前夕，他在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新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更高、更大的跨度上来概括我们党71年的历史：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深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访问人：这套理论现在还不好说完全成熟了吧？

龚育之：是的。但是，应当承认，这套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十三大报告的估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轮廓”已经构成，这个估价是有份量、有分寸的。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进一步用新的观点、新的发挥把这个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

访问人：“两”代领导，“两”场革命，“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这样几个“两”，是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进程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龚育之：还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强调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讲一条不行，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第一条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错误。

访问人：您最近发表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在说到这个关系时，是先讲继承这一条。

龚育之：那也是一种写法。那种写法的目的，是强调我们党领导的事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从历史转折进程的实感来讲，第一条当然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归根结底，就因为那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你说他当时就不想解决一点问题？还是想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被抓的那些人还是放了嘛。但是要给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平反，说它不是反革命的，而是革命的，那就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了。还有，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题目下，解放干部，多少改善一点被打击的干部的处境，还是可以做的，但是，碰到由毛泽东定案的大的问题，要作为冤假错案来平反，就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来，如果指出和纠正这些大的错误，毛泽东的旗子就丢了，刀子就丢了。就是说，在纠正错误和高举旗子之间搞了个简单化的对立——要高举旗子就不能纠正错误，纠正错误就会丢掉旗子。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

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遵义会议纠正当时中央领导的错误，最初也只讲军事路线错了，后来才逐渐指出王明的整个路线错了。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清理错误要有个过程，决不是把王明同毛泽东相比。王明根本不能同毛泽东相比，且不说王明后来的演变，在历史上他也说不上有什么功绩。毛泽东就不同了，他对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有那么大的历史功绩，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有那么大的创造，他的问题是在晚年发动“文革”，离开了他自己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所以，新时期要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条，就是继承。“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访问人：我们看到一些材料，说当时有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后来黄克诚同志出来讲话，发表了文章。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要求全面评价毛泽东，要求在历史决议中专门写一章“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当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是有那么厉害吗？

龚育之：要分几个层次、几个范围。一个是来自国外、来自港台、来自社会上的某些议论，那是很强烈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以至于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党内的某些议论，尽管有的语言也很偏激，有的意见也很错误，究竟同前面那种性质不同。不过，对待历史问题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而是采取激愤的、绝对化的态度，那是不足取的。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

讲了许多话，批评和拒绝了某些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此外，有些搞理论的人主张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认为如果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思想，就应当把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也算在内，如果错的不算，只算正确的，他们认为讲不通。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我们党用了这么多年，现在一笔勾消，政治上不利，也不合乎历史。而又合乎历史，又合乎科学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难道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至于这个理论成果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既然过去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来称呼这个理论成果，而毛泽东的确在创造这个理论成果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现在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取消这个称呼。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的许多观点，看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的科学的理论成果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把它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当然，在讨论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有同志提出那样的意见和主张，不好说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可能是在斟酌怎么处理这个复杂问题时的一种不成熟的思考，而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作种种思考，是正常的。在历史决议通过后，遵守历史决议，不再宣传那样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就不是什么问题。

这些说的是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我们明确指出和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的确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成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坚持不住，发生动摇，那么，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就可能被否定，我们党的整个立足点就可能被动摇。苏联出现的情况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党历来不赞成；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整个苏联历史和十月革命，结果如何，不是很清楚了吗？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联历史上的列宁加斯大林。斯大林的错误和黑暗必须否定，但是斯大林也有功绩，也有光明，不能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更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成果决不能否定。对待党的历史，人民革命的历史，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决不可以一笔抹煞，决不可以因为要纠正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错误而全

盘否定它的基本成果，当然也不能因为要维护它的基本成果而没有魄力去纠正错误。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且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继承和推进。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访问人：他们认为洋务派是对的。

龚育之：对洋务派的历史评价，也许还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过去可能有评价不足的方面。但是，认为只有慈禧太后加袁世凯，中国才能搞成现代化，这真是匪夷所思！否定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他们认为革命不好，革命只能造成动乱，动乱只能造成破坏。他们不了解革命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性，不承认革命为历史进步打开闸门的伟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尊重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选择的人们，也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而要肯定、要坚持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成果，就必须肯定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和坚持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

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